政治科學論叢／第 93 期／民國 111 年 9 月／頁 1-44

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作爲一種政治哲學方法*

鄭楷立**

摘　要

本文由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及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對「烏托邦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的批判來形塑一個「馬克思式」（Marxian）的政治哲學方法論，亦即，馬克思或是馬克思主義者們所應該偏好的形塑規範性政治哲學的方式。本文分爲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說明並釐清馬克思（及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是什麼，第二部分將他們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作爲一個重要指標來定位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立場，並且在當代政治哲學方法論中的四個主要概念區分裡，說明爲什麼這個批判可以被理解爲偏好某種規範性政治哲學的方法。據此，當我們將馬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置於當代政治哲學方法論的四組概念之中時，我們可以概要地得出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立場。

關鍵詞：卡爾馬克思、烏托邦社會主義、政治哲學方法論、政治道德主義、實踐依賴的原則

---

* DOI:10.6166/TJPS.202209_(93).0001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E-mail: kairespire@gmail.com。

收稿日期：110 年 12 月 16 日；通過日期：111 年 8 月 9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哲學家們只是各不相同地詮釋了世界，重點在於：改變它

—— Karl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壹、引言

本文探究馬克思主義和規範性論題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這個論題可以更抽象的表述爲：馬克思對「規範」（norms）和「事實」（facts）之間的關係的立場是什麼？亦即，一個如同《費爾巴哈題綱》第 11 條所倡議的「能改變世界的規範性原則」是什麼？我們能依據什麼樣的關於世界的事實來建構一個能改變世界的規範性原則？要回答這些問題，我認爲馬克思（及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參照點。列寧（1870～1924）曾經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說過馬克思主義是三大傳統的繼承者：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當我們認眞看待法國社會主義（特別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會發現馬恩不但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有著一個連貫且一致的立場，他們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也是回答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規範性論題的重要參考。

當我們總結馬克思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之後，並將這個批判置於當代分析政治哲學的方法論討論中時，便可從中得出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方法。而當我們概要地得出馬克思對規範和事實之間的關係，馬克思式的政治哲學方法將會是我們在形塑馬克思具體的規範性原則的重要指引。本文因此是在政治哲學方法論的層次上去討論馬克思本人的立場，而不是具體的說明馬克思本人的自由觀、平等觀或正義觀是什麼。因爲我認爲，正因爲馬克思及恩格斯自 1840 年中期之後對烏托邦社會主義有著連貫的批判，所以任何與他們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相悖的規範性立場，都不能說是馬克思本人會偏好的立論。而僅有當我們確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在政治哲學方法論層次上的寓意之後，我們也才能對後續形塑的具體規範原則有十足的信心。

本文因此分爲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說明什麼是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第二部分將這個批判置於當代四組政治哲學方法的概念之中去說明馬克思所採取的立場會是什麼，並於結尾提出馬克思式政治哲學方法的四個特徵。

貳、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的詮釋爭議

本節將概要地回顧馬克思及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的詮釋爭議，[1] 並在下一節說明我所偏好的詮釋。其次，這個回顧僅是爲了之後第二部分的論證進行鋪陳，對於這個爭議本身我並沒有原創性的觀點，同時我也認爲牛津政治理論學者 David Leopold 提供了一個近乎蓋棺而論的詮釋。接續，我將介紹馬克思及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並說明爲什麼 Leopold 的詮釋提供了一個近乎完備的觀點。

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之所以是個爭議，首先是因爲他們一方面盛讚並吸收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主要是聖西蒙（Henri Saint-Simon, 1760-1825）、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和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的主張，另一方面又藉由批判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來區隔自身的「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其次，馬克思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是多重的，以至於它包含了幾個不同的論證。再者，要理解馬克思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是什麼，就必須清楚界定什麼是烏托邦社會主義，然而關於烏托邦的概念就有幾種不同的理解方式，隨著指稱對象的改變，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的意義也會跟著改變。上述三個論題產生了詮釋上的困難和表面立場上的不一致。

「烏托邦」（utopia）的字彙最早出現於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一書之中，由兩個希臘字所組成：*ouk*（意味著 not 或是 no）和 *topo*s（意味著 a place），合在一起指稱 nowhere (*outopia*)

[1] 近年來將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的說法區分開來是「馬克思學」（Marxology）的一個主流看法（Carver, 2008；2010），或見萬毓澤（2018：15-24；2021）對恩格斯編譯馬克思作品的說明。但根據 David Leopold (2005: 444-445) 的說法，恩格斯固然在 1840 年代初期對烏托邦實驗有所貢獻，但自 1840 年代中後期，兩人在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議題上，並沒有重大的歧異，我在這篇文章中接續這個看法。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和 good place (*eutopia*)（Kumar, 1991: 1；Sargent, 1994: 5；Vieira, 2010: 4）：亦即，一個無處可尋的好地方。爲了防止讀者迷失在馬恩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盛讚、繼受和多重批判的迷霧之中，烏托邦的字源是我們最好的指北針。另外，我在此遵循 Leopold 將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定義爲「那些細緻描繪未來理想社會主義藍圖的人」（2005：447）。[2] 這個定義有幾個好處，首先這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一個共享的特徵；這個「描述性」（因此不具備太多批判色彩）的界定本身可以囊括許多的批判可能；其次，如同 Leopold 所指出的，這個定義不但和一般的烏托邦主義的界定一致，也可以有效地區分烏托邦社會主義跟馬克思及恩格斯之間的不同（2005：448）。當然，如何界定烏托邦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從而其他詮釋和界定的方式都是可能的，我並沒有要主張只有 Leopold 的界定才是唯一的方式。

另一方面，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中的「科學」性格，如同 Terrell Carver 指出的，在德文中 *Wissenschaft* 意味著「將知識系統性地概念化」，而不是在英文傳統中所指稱的比較狹義的科學定義（2008；2010）。[3] 在這個意義上，科學的社會主義並不預設了如同自然科學般的「法則性」（law-like），而是一種「可誤的」（fallibilist）且持續修正的科學觀（Collier, 2004: 62-63）。這樣的科學觀如同恩格斯所說的：「科學……從較低的知識水準上升到越來越高的知識水準，但永遠不會通過發現所謂的絕對眞理而抵達一個他無法再進一步發展的點……正如同知識無法在人類完美、理想的狀態下得出

---

2 Smith (2009: 101) 主張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使用過「藍圖」的詞彙，但認爲他們有關於社會的「計畫」。因此他對於將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定義爲描繪細緻未來社會藍圖的說法感到懷疑。

3 Paul Thomas (1991: 25) 主張馬克思本人並沒有使用「科學社會主義」的詞彙，這毋寧是恩格斯的概念。但不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明確的指出，他跟恩格斯的路徑首先是「科學地」（Marx, 2017: 161）；馬克思也在 “Conspectus of Bakunin’s Statism and Anarchy” 中明確的使用了「科學社會主義」一詞，用以對立於烏托邦社會主義（Marx, 2019: 1021）。所以 Paul Thomas 的說法是錯誤的，感謝萬毓澤教授指正。另一方面，柯恩（Cohen, 2001: 44）指出，恩格斯的書：*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其正確的德文書名翻譯應該是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Utopia to Science*，意味著社會主義在成爲科學的之前是烏托邦的；因此對恩格斯來說社會主義不只是「科學的」（scientific）更是一個「學科」（science），而英文書名中完全刪除了這個重要的演變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完整的結論一樣，歷史也無法做到；一個完美的社會，一個完美的國家，都是只能存在於想像中的事物」（Engels, 1990b: 359）。在這樣的科學觀之下，即便我們無法抵達全知終點，仍然能在過程中不斷學習眞理是什麼。由此觀之，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於未能限制其科學性，並宣稱掌握了組織一個「全新」社會的知識；而科學社會主義是可誤的，並嘗試從現存社會中去理解人的行動（Collier, 2004: 63）。

簡單地界定完烏托邦和科學社會主義之後，我們進入批判的實質內容。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讚賞並承繼其部分理念

馬克思及恩格斯在不同的文本中都讚賞並承繼了三位主要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聖西蒙、傅立葉和歐文等人的思想（Geoghegan, 1987: 22-26；Leopold, 2015: 44；Levitas, 2011: 58-64；Lukes, 1984: 155-156；Paden, 2002: 69；Smith, 2009: 99-100；Yassour, 1983: 222）。像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

> 於是，本來應該根據歷史條件而採取的行動，遂讓位給他們**個人發明的行動**；本來應該隨著歷史演變而誕生的解放條件，讓位給**不切實際的狂想**；本來應該自然漸進發展而成的無產階級組織，讓位給這些發明家**刻意營造出來的組織**，依他們看來，他們那些社會計畫的宣導和現實將會決定未來的歷史……這種對未來社會充滿幻想的描繪，出現在無產階級還很不發展、因而還以幻想的方式來理解本身地位的時候，它來自無產階級追求社會普遍改造的這種最初的模糊的期望。**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著作也是由批判的成分構成的。這些著作抨擊現存社會的全部基礎。因此，它們提供了啟發工人覺悟的寶貴的材料。**[4]（Marx & Engles, 1976: 515-516）（粗體字是我的強調）

在這個段落中，馬恩除了批判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空想行爲之外，也讚賞了他們對現存社會體制的一切原則進行批判。又個別來看，譬如說傅

[4] Lawrence & Wishart (2022) 已將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全系列電子化免費瀏覽搜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立葉對階級和階級衝突的看法，便爲恩格斯所盛讚並向馬克思推薦傅立葉做爲最佳社會主義外國作家的人選之一（Geoghegan, 1987: 23）；恩格斯說道：他希望「從最爲接近我們原則的東西開始來提供給德國讀者；最好的像是傅立葉、歐文、聖西蒙主義者們」（Engles, 1982: 27）。又譬如有論者認爲聖西蒙之於馬克思的影響早在他還在德國的時候就開始了（Geoghegan, 1987: 24-25）；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說道：「傅立葉關於捕魚、狩獵等等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的斷言是其天縱英才之一」（Marx & Engles, 1975a: 88）。尤甚者，在 1825～1831 年間，聖西蒙主義者發展了關於剝削的理論（Cunliffe & Reeve, 1996），而我們都知道剝削是馬克思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又或如馬克思認爲歐文在唯物史觀上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並指出歐文在英格蘭協助了散播「合作運動」（cooperative movements）的種苗（Leopold, 2014: 413-415）。而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烏托邦到科學》德文初版序言中說道：「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們很自豪我們不只是聖西蒙、傅立葉和歐文的後繼者」（Engles, 1989: 459）。

在上述文本中我們可以看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三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讚賞，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繼受了他們部分的思想。[5] 當然，最終馬恩還是展開了他們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多重批判，而也正是因爲這些批判才使得他們得以界定自身爲科學社會主義。接續我將介紹馬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

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多重批判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認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信念僅是狂熱和迷信（Marx & Engles, 1976: 517）；另外在馬克思寫給 Sorge 的信件中提到，他認爲在唯物和批判性的社會主義出現之後，烏托邦主義只能是「愚蠢的，陳腐過時的，以及根本上反動的」（Marx, 1991: 284）。這都說明了馬克思及恩格斯不只推崇三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也批判他們。

具體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可以主要歸結爲四

[5] 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什麼程度上繼受了三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便不是本文所能及所要回答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個子批判：「轉型手段批判」（the anti-political transition criticism）、「知識論批判」（the epistemological criticism）、「不民主的批判」（the undemocratic criticism）和「不必要的批判」（the unnecessary criticism）（Avineri, 1973；Leopold, 2016；2019；Lukes, 1984；Paden, 2002）。[6] 這四個批判本身可以說是彼此相連，區分開來僅僅是爲了概念清晰的目的。接續我將簡單陳述各個批判的內容，及文本證據。

首先是「轉型手段批判」，對那個時候的社會主義者來說社會轉型問題是一個實際的理論問題，如何能帶動有效可行的社會轉型是任何嚴肅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理論家必須回答的。而馬克思及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一個主要批判是他們的轉型手段本身並不可行，因爲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本身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同時他們對無產階級和階級鬥爭有著錯誤的認知；以及抱持著「去歷史化」（ahistorical）的社會轉型觀點（Leopold, 2015: 44-45；2016: 116-117）。這表現在他們認爲可以藉由小規模的共治社區來做爲社會轉型的手段和目標（Leopold, 2012），亦即當我們可以在小規模的層次上完成良序社會的實驗，也就可以在大規模上複製實驗結果。從而社會轉型的基礎並不在於辨識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社會轉型能動性，而在於在小規模社區中實踐良序社會的原則，也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是反政治的，因爲完全忽視了實際存在社會中的權力和政治鬥爭的實況。而如果社會轉型可以倚靠小規模的共治社會實驗來進行，這樣的觀點是去歷史的，因爲新社會不必然誕生自舊社會之中，總是可以棄置過去歷史隨意地誕生。若是小規模共治社會是成功且可以被複製的，那麼在理論上在歷史的任一時刻都可以被再製，從而社會轉型的知識可以是去歷史化的。

總的來說，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在社會轉型的手段上是充滿問題的。而我們可以在《共產黨宣言》中找到支持這個說法的文本，馬克思和恩格斯

---

6 我並不是說這四個批判總結了馬恩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而是這是其中「最主要」的四個主要批判，特別是後面的三個批判是本文接續要討論的主要批判。而這些批判本身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重整，也因此會有不同的形塑方式。再者，「不民主的批判」和「不必要的批判」在中文翻譯中可能會產生誤解，這兩個批判具體指稱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是不民主的（但還不到反民主程度），以及烏托邦理念對馬克思來說是不必要的。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認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看見了階級對立，但對他們來說無產階級並沒有任何歷史能動性或獨立政治運動的可能性，而無產階級對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來說僅僅「只有在作爲最不幸的階級時才存在……也因此，他們排斥一切政治行動，尤其是一切革命行動，他們希望透過和平的手段來達成目標」（Marx & Engles, 1976: 515）。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批判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清楚說明了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反政治、去歷史、去階級化的社會轉型觀點。

其次是「知識論批判」，亦即：「烏托邦計畫和藍圖預設了一種無法得知的知識，從而這個知識論上的挫敗使得他們的計畫毫無用處」（Leopold, 2016: 122）。這個批判本身可以說是非常直觀，在社會科學中要做出有效的預測本身都不容易了，更別說是給大規模社會轉型所需要的知識本身近乎不可能。若是未來理想社會的知識是現在無法全面掌握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們便宣稱了一種他們無法得知的知識，從而他們自視爲先知或彌賽亞（而他們也的確自視爲先知和救世主）（Webb, 2000: 15）。或是更簡單地說，如果有人邀請你爲未來「美好社會」制定細緻的藍圖，我相信大部分人（如果不是所有人）僅能給出一些參雜臆測的計畫。因爲，關於未來美好社會的知識本身，並不是我們現在能夠知曉的，更別說替未來世界規定一套訂製西裝。也因此在馬克思回覆 Domela Nieuwenhuis 的信件中說道，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想望一個未來革命的行動綱領必然是荒謬的（Marx, 1992: 67）。知識論批判爲幾個主要的理論家所支持，Avineri 認爲馬克思對烏托邦主義者的主要考量便是知識論上的問題，亦即他們的計畫是不可實現且不實際的（1973：323-324）；Lukes 也認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宣稱了一種他們現在無法得知的知識（1984：157-158）；而 Darren Webb 也支持相同的立場（2000：19）。而馬克思曾說過他不爲未來的烹飪店寫食譜，因爲那終究包含了一些我們現在無法得知的知識。若是知識論批判是馬恩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的核心，那接續的不民主的批判和（未來藍圖是）不必要的批判便是知識論批判的延伸。

「不民主的批判」認爲，烏托邦社會藍圖本身限制了（如果不是完全禁止）未來人們決定自身事務的自由（Leopold, 2016: 118）。不民主的批判的理由是，如果你對未來社會有個細緻藍圖，而藍圖本身是拿來按圖施工的，也因此未來社會的人們也只能是工人而不會同時也是設計師。或簡單來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說，如果父母對於小孩的未來有細緻規劃，從而小孩的自由發展也被大幅度的縮減（如果不是完全沒有自由的話）。幾個文本證據包括了，馬克思指責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1814-1876）未能承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和人民自己所創造的社會運動聯繫在一起（Marx, 1989a: 520）。又譬如恩格斯在解釋他爲何不願意多解釋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的性別關係時說道，這個議題會在一個全新世代成長後解決，那個世代不會在乎我們今日認爲他們應該做些什麼（Engels, 1990a: 189）。馬克思因此認爲烏托邦計畫「用新的教條主義原則面對世界並宣布：眞理即此，伏首稱臣！」（Marx, 1975a: 144）。這無疑是十分菁英性格的作法，從而飄散著濃郁的反民主芬芳。另外，不民主的論證也爲 Geoghegan (1987: 31-32) 和 Collier (2004: 54) 所支持作爲馬克思及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主要批判之一。民主從來都是馬克思思想中一個重要的概念（蕭高彥，2020：476-519），而三位主要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本身都是菁英主義者（Webb, 2000: 15-19），因此不民主的批判既是「規範性的主張」：亦即未來社會應該由未來的人們決定；同時也是一個「事實性的陳述」：即未來社會的人們會決定自己的未來。如果關於未來美好社會的知識是不可得，且未來社會應該並且會由未來的人們所決定，那麼我們似乎可以得出第四個批判：未來良序社會的藍圖是不必要的結論。

「不必要的批判」認爲，基於上述幾個原因（但不限於此），社會主義者不需要繪製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藍圖。第四個批判不只是總結上述理由的結論而已，其本身也可以作爲一個單獨的批判，並且如已逝英國政治哲學巨擘柯恩（G. A. Cohen, 1941-2009）所指出的，馬克思不需要未來世界藍圖的立場受到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影響（2001）。撇除上述所說的三個理由：社會轉型不能倚靠小規模共治實驗，或是對於未來良序社會相關知識的「不能」（incapacity），或是未來社會是開放且由未來人們民主決定之外，第四個反對爲未來社會主義繪製藍圖的理由是，依據馬克思本人的歷史理論來看，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只能誕生自資本主義社會之中（Leopold, 2016: 127；Webb, 2000: 89-90）。像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生產者的合作代表了在舊事物中形塑新事物的第一批芽，也因此它們展現了一個新生產模式如何自然的誕生自舊的模式（Marx, 1998: 438）；在另一個地方馬克思提到：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德國共產主義者是一切烏托邦主義的最堅定的反對者，而且遠非排斥歷史發展，事實上將其奠基在歷史發展之上」（Marx, 1976b: 537-539）。上述這兩個引文都支撐了馬克思本人認爲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只能誕生自資本主義，更具體地來說，社會主義只能誕生自資本主義的敗亡之中（Vieira, 2010: 13）。若是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誕生自資本主義社會中，那麼，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問題就在於他們認爲他們能夠去歷史地替未來社會設想一套藍圖。從而這個替未來規定藍圖的行爲本身，忽視了人類行爲總是受歷史社會條件所限制，因此我們不是在眞空中隨心所欲地替未來設計新衣裳，反而能得到的衣裳總是被人類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所規定。不必要的批判因此認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替未來繪製藍圖的做法忽視了歷史發展的限制和傾向，從而是一件不必要的事。

上述四個馬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是彼此相互關連的，而這四個批判也有力的證明了馬克思跟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有一個深思熟慮後的立場，從而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並不只是一個政治修辭的區分，毋寧是一個深刻的理論立場。但目前爲止我所要做的只是陳列這些批判的內容和理由，並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三位主要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有著「褒貶並陳」的看法。因此，一個詮釋上的困難便在於如何整合這個褒貶並陳、看似前後不一的說法，就是馬恩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研究者的首要課題之一。下一節我將整理 Leopold 的說法，並說明他如何提供一個在我看來近乎完備的詮釋。

參、David Leopold 的詮釋

Leopold 藉由區分兩件事來解釋馬恩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褒貶並陳，他建議我們區分「時間序列上的區分」（a chronological distinction）跟「文本層次的區分」（a textual distinction）（Leopold, 2005: 452-456；2007: 231；2015: 43）。時序上的區分意味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相對同情傅立葉、歐文和聖西蒙，但對於他們的後繼者們抱持著比較嚴格的批判態度（Leopold, 2005: 452-453）。譬如《共產黨宣言》指出：「雖然從許多方面來說，這些體系的創始者【也就是聖西蒙、傅立葉和歐文】充滿了革命性，但他們的信徒卻無一例外的都是反動派。他們緊抓著他們老師的原始觀點不放，完全無視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於無產階級進步的歷史發展，因而，他們不遺餘力而且孜孜不倦的想弭平階級鬥爭，調和階級對立」（Marx & Engles, 1976: 516）。這段引文說明了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對馬恩來說是有革命性格的，但當他們的後繼者們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仍然拒絕階級鬥爭和政治行動時，他們的主張便全然反動。相較於他們的後繼者來說，馬恩認爲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因爲才剛在階級對抗的萌芽階段，從而他們還無法認識到歷史發展的傾向和無產階級的普遍性格，因此不能責怪他們所受到的歷史侷限（Leopold, 2005: 457）。「這些體系的建立者的確看到了階級對立，也看到了主流社會形式當中會導致解題崩壞的因素的作用。然而，對他們而言，當時猶在襁褓中的無產階級並沒有任何的歷史主動性或是獨立政治運動的可能性」（Marx & Engels, 1976: 515）。但後期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便沒有這種歷史限制，他們處於歷史發展的高峰，見證了階級鬥爭的激烈性，從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身處的歷史處境中，後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只能是反動的。其實在馬克思於 1873 年所寫作的〈政治冷漠主義〉中，他就清楚地總結了 Leopold 的說法。馬克思說道，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因爲受限於社會條件的未充分發展所以只能寄望未來社會的模型並反對所有社會改革行動，並點名批判歐文的後繼者 Bray，其出書譴責當時英格蘭所有社會運動的行爲（Marx, 2019: 1013-1014）。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對於早期和後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有著不同程度的究責。

其次是文本上的區分，Leopold 認爲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性」（critical）和「建構性」（constructive）面向有著不同態度（Leopold, 2015: 39）。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批判面向便是他們批評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負面特徵，而建構性面向便是他們描繪未來理想社會的「正面」（positive）的構成要素（Leopold, 2005: 454）。這方面的文本證據像是在〈論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說道，「烏托邦主義教派的創始者們……在他們**對現今社會的批判中**清楚地描述了社會運動的目標，取代工資制度及其統治階級的所有經濟條件」（Marx, 1986；2019: 946）（粗體字爲我的強調）；或是如恩格斯認爲德國社會主義者被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最糟且最理論的部份所吸引：亦即「對未來社會的概要計畫」，卻擱置他們最好的部份：亦即「對現存社會的批判」（Marx & Engles, 1975b: 614）；又或如在馬恩批評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Karl Grün (1817-1887) 錯誤地聚焦在傅立葉系統性而不是批判性的作品上，因爲正是傅立葉作品的批判性面向才是他最重要的貢獻（Marx & Engels, 1975a: 510, 543）。一言以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讚賞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並繼受他們的批判的實質觀點（像是階級衝突或是唯物史觀等等）；但另一方面，馬恩對於他們所描繪的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本身是完全否定的（Leopold, 2007: 232）。

更重要的是馬恩所爭論的並不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未來藍圖「在實踐上」不可行，也不是說他們在未來藍圖的設計「內容上」有問題，而是完全拒斥我們需要繪製未來世界的藍圖的這件事。上述的四個批判本身都支撐了爲什麼我們不需要繪製未來理想社會主義藍圖，從而馬克思及恩格斯並不是在轉型效力和內容上去批判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們。兩個主要的文本證據，一個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書稿》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應該被確立的狀態，不是一個『現實』（Wirklichkeit）所要去瞄準的理想。~~費爾巴哈~~我們稱爲共產主義的，是那種實踐地揚棄目前狀態的實際的（Wirkliche）運動」（Marx, K. & F. Engels 著，孫善豪譯，2016：39）。[7] 另外一個主要的文本證據在〈論法蘭西內戰〉，馬克思說道：

> 工人階級……沒有現成的烏托邦來引介給一般群眾。他們知道，爲了實現他們自己的解放，以及伴隨著當前社會被其自身經濟動因所不可抗拒地趨向的更高階形式，他們將不得不經歷長期的鬥爭，經歷一系列轉型環境和人們的歷史進程。他們沒有需要實現的理念，而是要釋放正在崩潰的舊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的新社會要素。（Marx, 1986: 335；2019: 897）

不論是《德意志意識形態書稿》中所說的共產主義是那種實踐地揚棄目前狀態的實際的運動（從而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個理念「而已」），或是〈論法蘭西內戰〉所說的工人階級沒有需要實現的理念，都說明了馬克思強調共產主義運動（從而作爲運動主體的無產階級本身）並不需要實現什麼理念，「他們要做的是解放自身」。無產階級不需要替運動規定一個需要實現的理念，反而他們解放自身的枷鎖便是促進社會轉型的關鍵。

[7] 本段文字的下底線及刪除線乃爲作者所引用文本之原始呈現。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文中最後一句清楚地呈現了馬克思本人的歷史理論：充滿著「黑格爾式」（Hegelian）的辯證法的歷史觀。孫善豪將「歷史唯物論」定義爲：「從一個變動的、辯證的、唯物的觀點，來解釋歷史」（2009：2）。簡言之，一個辯證史觀會認爲社會階段的轉型能量和可能在於現在社會階段的自我成熟從而所帶來的自我毀滅，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史觀不同於黑格爾的地方在於歷史進展的動力不在於歷史主體的自我意識本身，而是物質，是生產力的進展；而發展的單位不是文化而是經濟結構本身（Cohen, 2001: 47-49）。若是如此，「解方便是問題的完全發展」（Cohen, 2001: 54）。[8] 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史觀之下，未來社會主義的出現只能來自於資本主義的廢墟之中，也因此我們不必向外尋求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反而必須（以政治經濟學的方式）分析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藉由質問問題本身來尋求社會轉型的能量和可能。若是如此，烏托邦社會主義可以被視作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尚未成熟下的一個早熟的社會現象，而科學社會主義可以視作是成熟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主義（作爲一個主體）提升自我意識的表現（Cohen, 2001: 73）。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煉金術和烏托邦主義分別構成了化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雛型（Leopold, 2005: 460；Marx & Engles, 1988: 107）。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史觀之下，社會或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因而是接生婆而不是社會工程師（Cohen, 2001: 58-78）。社會或共產主義者只能促進資本主義的成熟從而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中去迎接新社會的到來，而不是（也不能）在眞空中去建構新社會。

當我們理解馬克思歷史觀，以及 Leopold 所區分的時序和文本上的不同後，就能更清楚的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爲什麼一方面讚賞繼受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批判後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以及他們描繪未來理想社會藍圖的行爲。行文至此，我希望我呈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的大體內容，以及他們是「有意識地」在反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思潮。從而我們可以說，當我們深究馬克思及恩格斯在反烏托邦社會主義中的論述之後，任何與此相悖的規範性原則（或政治哲學），吾人

[8] 在《共產黨宣言》中的第一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Marx & Engels, 1976: 481），也可以在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下去理解。

臺灣人文與社會期刊資料庫

便可以主張那不是馬克思或恩格斯「深思熟慮後」會採取的主張。[9] 馬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因而可以在後續形塑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路途上起一個定錨的作用。

但對許多人來說，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所倡議的共產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烏托邦，從而在這個烏托邦的意義下（有個完善社會的願景或想像，相對於烏托邦社會主義詳細的描繪未來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差距並不大。這個提問本身是有意義的，它明確的指出如果馬克思（及恩格斯）本人也有未來理想社會主義社會的願景，那麼他們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又有什麼不同？這個問題是我嘗試要解釋的，也就是奠基在馬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之上，同時他們又有對未來理想社會主義社會的願景，那麼我們該怎麼理解這件事？

接續我將討論在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中常見的提問是：馬克思（及恩格斯）本人有「理想社會」（ideal society）的願景或想像嗎？或是馬克思（及恩格斯）有對理想社會的「積極性建議」（positive constructions）嗎？假設一道光譜由左至右是「道德懷疑主義」（amoralism）到「現實主義」（realism）再到可能是康德式（或非常形式）的道德立場。上述關於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討論已經在光譜的右邊畫上一道清晰的界線，說明了馬克思及恩格斯所拒絕的規範性方法；接續我將在光譜的左邊也畫上一道界線：亦即，馬克思（及恩格斯）確實是有理想社會的願景並支持某些特定的政治哲學方法，從而不是不談規範性問題的。若是下一節成功的指出他們倡議某些規範性原則和未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的願景，那麼，這個不同於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方式，就是馬克思及恩格斯所偏好的政治哲學立場。

肆、馬克思是烏托邦主義者嗎？

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本身並不是要完全否定任何

[9] 接續我將規範性原則和政治哲學作爲交互使用的詞彙，藉由擴大兩個的模糊地帶來涵蓋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立場。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想像，也不是要主張我們不需要任何規範性原則，反而對他們來說形塑規範性原則是有特定的限制。因此，Lukes 認爲馬克思是某種「反烏托邦主義的烏托邦主義」（1984 : 155）。當然，這句話中的兩個「烏托邦」指涉不同的意義，馬克思是「反烏托邦主義」的，因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給予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細緻藍圖，馬克思（及恩格斯）並沒有給予如此細緻的描繪；[10] 而馬克思是「烏托邦主義」的，因爲他有未來「理想社會」（ideal society）的「願景」（vision）或倡議某些規範性原則（cf. Avineri, 1973: 326；Claeys, 2018: 233；Geoghegan, 1987: 34；Levitas, 2011: 46-53；Lovell, 1992: 193；Lukes, 1984: 156；Paden, 2002: 68-69；Smith, 2009: 119；Webb, 2000: 79-108；Yassour, 1983: 223-225）。從現有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認爲馬克思（及恩格斯）有未來理想社會的願景或是倡議某些規範性原則是一個近乎無爭議的說法。原因很簡單，即便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無所知的人都知道他們倡議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知道他們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主要舵手。即便我們不知道具體來說他們要的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是怎麼運作，我們知道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是一個沒有資本主義弊端的社會，我們至少知道在那個理想社會中不會有剝削和階級關係。上述的種種願景都蘊含著規範性的期待，從而不是道德懷疑主義，因此認爲馬克思（及恩格斯）沒有「未來理想社會的願景」（a vision of an ideal society）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規範性原則一般來說指稱那些認爲「世界的某些方面需要被改變以服膺於某些描述和原則」（O’Neill, 2009: 223），或是很簡單的來說，指稱那些告訴某個主體應該如何行動的一般性指令（Cohen, 2008: 229）。規範性原則是「規範性的」（prescriptive）而不是「經驗性」（empirical）和「描述性」

[10] 參見 Paden (2002: 80) 爭議何謂細緻描繪的定義。當然，什麼樣的描述可以被稱作細緻本身是一個界定的問題，也因此當我們拼拼湊湊馬克思（及恩格斯）在各個文本中對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的描述之後，也可以主張他們有一個細緻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而問題點只在於這個藍圖相對於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而言較不細緻。但如同上述四個批判所指出的，馬克思和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區別不在於細緻與否，而是我們應該怎麼形塑社會轉型的規範性原則，從而這是一個根本方法上的區別。見 Webb (2000: 58-78) 反對馬克思是烏托邦主義者的說法。

臺灣人文及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descriptive）的原則而已。規範性原則可以有幾個不同的規範性來源：像是道德、法律、宗教或是社會禮儀（Pojman & Fieser, 2012: 3-7），當然法律、宗教或是社會禮儀的規範性基礎是可以由道德的角度去進一步解釋他的規範性來源，但作爲規範性原則並不總是需要這個進一步的質問。若是規範性原則在非常一般的層次上指稱那些指引或規約行動的原則，很明顯地在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之中，也存在著數個「必要的」規範性原則，像是「生產工具公共化」（the public control of means of production）、「非剝削原則」（non-exploitation）、「無階級的社會」（a classless society），甚至是「非異化原則」（non-alienation）。[11] 不論馬克思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具體來說包括了哪些規範性原則，至少生產工具公共化、非剝削原則和無階級的社會都不僅是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描述而已，[12] 更重要的是，它們都是規範性原則。它們規定了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工具「必須」公共化，「必須」是一個沒有剝削和階級區分的社會。也因此這些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規範性原則要求無產階級邁向這個目標，這些規範本身不只是用來描述未來社會主義社會而已，他們更是願景，更是行動的指引。對於作爲期望社會轉型的社會主義者及革命份子的馬克思及恩格斯來說，是不可能不介入規範性原則的範疇去推動社會改革，就像《資本論》不僅僅只是描述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的「價值祛除」（value-free）的著作，[13] 讀者也在其中感受滿滿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正義。

我希望上述的解釋足以說服讀者馬克思及恩格斯不但有未來理想社會的願景，同時這個願景本身包含了一些必要的規範性原則。從而我們可以說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確有某些對未來理想社會的積極性建議，而這個介於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和道德懷疑主義的中介立場就是馬克思及恩格斯所偏好

---

11 人們對於馬克思理想社會中所涵蓋的規範性原則有不同觀點，關於這點我保持開放。在此我並不爭論具體的內容，參見 Bertell Ollman (1977) 對馬克思的共產社會願景的重建，或是 Peter Hudis (2013) 的討論。

12 我相信某種馬克思主義的詮釋可以只停在這裡，認爲馬克思只是在描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實際上」會如何運作。

13 Value-free 翻譯成「價值祛除」而不是「價值中立」是因爲 value-neutral 更適合翻譯成「價值中立」。前者指稱不涉及任何價值描述或評判，後者指稱在眾多價值和判斷之間保持中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政治哲學方法（或形塑規範性原則的方式）。但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特殊的立場？至此，本文的第一部分結束，接續我將進入當代政治哲學方法論的討論去界定並解釋馬克思式政治哲學方法。

伍、當代分析政治哲學方法論的四組概念

過去二三十年裡，在分析政治哲學／理論的圈子裡，持續辯論政治哲學的用處和目的，以及如何做政治哲學等等的問題。形塑這個討論「主要」是下列這四組概念：「理想和非理想理論」（ideal and non-ideal theory），「實踐依賴和實踐獨立」（practice-dependence and practice-independence），「政治道德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moralism and political realism），以及「敏於事實和鈍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fact-sensitive and fact-insensitive normative principles）。基本上我們可以由這四組概念去介入什麼是以及怎麼做政治哲學，其背後所產生的論文量也非我可以在此完整介紹的。[14] 接續我將介紹這四組理解政治哲學方法的概念，當我們對於當代政治哲學方法論的辯論有概要性的認識之後，就可以依據這些分類去定位並說明爲什麼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採取了特定的政治哲學方法。讓我們先從最廣泛的「敏於事實和鈍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的分類開始。

一、敏於事實和鈍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

第一組概念是由當代英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柯恩所提出。[15] 而規範性原則和事實之間的關係，便是柯恩在批評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下所開展延伸的一個「後設倫理學」（meta-ethics）的討論。也因此這組概念是在非常抽象的層次上去討論規範性原則和事實之間的關係。柯恩區分了兩種規

[14] 關於這方面的概論性的回顧文章，見 Stemplowska & Swift (2012)；Laura Valentini (2012)；John Simmons (2010)，以及 Swift (2008)。

[15] 柯恩從早期使用分析哲學的方式重構馬克思歷史理論，到後期放棄馬克思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政治哲學，一生對羅伯・諾齊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 1931-2013）和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展開綿密深刻的批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範性原則：鈍於事實和敏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並且他稱呼前者爲「最終原則」（ultimate principles）後者爲「管制規則」（rules of regulation）。柯恩的論證很清晰，他認爲一個規範性原則 (P) 必定可以進一步分離爲一個事實 (F) 和一個更爲根本的規範性原則 (P1)（Cohen, 2008: 232-234）。據此，在不斷的分離 P1, P2, P3…… 到 Pn，我們最終會抵達一個不反映任何事實的規範性原則，也就是鈍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這裡所謂的原則不反映任何事實意味著：「沒有任何事實」被用來作爲「認可」這個規範性原則的基礎（Cohen, 2008: 231）。舉例來說，我認爲「我們應該要盡可能幫助身邊朋友渡過難關」是一個規範性原則，而這個原則可以進一步的區分爲：「我們要幫助有難關的人」這個更爲鈍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以及「我重視我的朋友」的事實。從而「我們要幫助有難關的人」也可以再更進一步的分離出下一個更鈍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和一個事實。柯恩認爲這個邏輯結構本身最終會引導我們抵達一個完全鈍於事實的最終規範性原則。

若是柯恩的論證是正確的（而我也認爲他是正確的），那麼他認爲這個區分本身區分了政治哲學中兩種不同的規範性原則：最終規範性原則和管制規則。最終規範性原則是「在原則層次上」（第一個層次）幫助我們釐清一些根本立場的問題，而管制規則則是基於我們對事實的理解下所採用於產生特定效果的規則，因而是「在實踐和應用的層次上」（第二個層次）的問題（Cohen, 2008: 265-272）。[16] 我們可能會詢問區分最終規範性原則和參雜了事實的管制規則的意義是什麼？簡單來說，當我們區分了「根本原則的問題」以及「管制某個特定人類實踐」的問題之後，提問就可以很清晰從而解決了許多各說各話的困擾。譬如像是死刑的討論，有人認爲因爲司法誤判的原因死刑會導致誤殺的問題，有人認爲沒有人有權利去剝奪其他人的生命。前者就是管制規則的問題，所以只要我們可以確保沒有誤判的可能，死刑是允許的；後者則是根本原則問題，不論有沒有誤判，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是道德上不被允許的。當理論層次一被區分開來，問題應該隸屬於哪個層次就很清晰，從而很多質疑跟挑戰可以被釐清。

[16] 關於分析政治哲學的基本層次，請參見柯恩（Cohen, 2011: 225-235）所認爲的作分析政治哲學的方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認爲柯恩的理論分析層次的區分可以有效地解決很多政治哲學中的爭論，同時我也認爲柯恩的區分是在政治哲學方法論討論中最爲廣泛和根本的分類。下述的「理想和非理想理論」、「政治道德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和「實踐依賴和實踐獨立」的區分都可以安置在柯恩的理論分析層次內討論。接續我要介紹其他三個重要的分類。

二、理想和非理想理論

除卻柯恩的區分之外，另一個很廣泛的區分便是理想跟非理想理論的區分。[17] 依據羅爾斯的定義，理想理論便是預設了人們會「嚴格服從」（strict compliance）從而在一個「理想情境下」（favourable circumstances）所形塑出的原則會是什麼，而非理想理論詢問在一個人們「部分服從」（partial compliance）且「不理想的情境下」（unfavourable circumstances）所該採用的原則會是什麼（Rawls, 1999a: 215-216）。嚴格服從預設了幾乎所有人都會服膺於正義原則，而理想情境是「那些假使政治意志存在之下使得一個憲政制度可能的那些條件」（Rawls, 2001: 101）。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因此是「理想的」（ideal）因爲在眞實世界中嚴格服從和理想情境是不可得的。而非理想理論便是，當我們有理想理論之後，用於處理因爲部分服從和不理想情境下所產生的不正義。更重要的是，對羅爾斯來說，理想理論在位階上優先於非理想理論，而且是非理想理論的必要條件。這意味著，要做非理想理論就必須要有理想理論作爲指引，從而我們必須要有理想社會的規範性藍圖。「因爲在理想被確認之前……非理想理論缺乏一個目標，一個可以通過參考它來回答疑問的目標」（Rawls, 1999b: 90）。因此大部分支持理想理論作法的政治哲學家們也支持「理想理論先於非理想理論」的命題，和「理想理論是政治哲學必要條件」的命題。

然而，相對於羅爾斯和理想理論的支持者們，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 1933-）和強納森・沃夫（Jonathan Wolff, 1959-）都認爲政治哲學的目的是「辨識和修正『明顯可見的不正義』」（the manifest injustices），而不是

[17] Non-ideal theory 我翻譯成「非理想理論」而不是「不理想理論」。Jonathan Wolff 在數個地方都指出，non-ideal theory 有一種負面的意涵，從而他比較喜歡稱呼 ideal theory 爲 non-realistic theo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追尋一個理想的正義理論，從而理想理論既非必要也不充分之於辨識和修正不正義的目的來說（Sen, 2009: ix, 100, 410；Wolff, 2015: 215）。[18] 如果政治哲學的目的在於辨識和消弭社會不義，而且如果我們可以辨識明顯可見的不正義而不需要借助理想理論來做這件事，那麼理想理論便不是政治哲學的必要條件。這意味著，政治哲學需要辨識並消弭社會不正義：像是貧窮、剝削、壓迫和社會不平等，等等顯而易見的不正義。從而，政治哲學家們需要將大多數的能量聚焦在上述的不義身上，而不是如羅爾斯《正義論》發表之後不斷追尋正義是什麼的問題。

以沈恩和沃夫爲首反對理想理論必要性的立場當然是很有爭議的，而支持理想理論的政治哲學家大體上有三種方式來回應這個問題：其一是，理想理論本身便有價值即便它對於這個世界沒有「指引行動」（action-guiding）的功用（Estlund, 2011；Swift, 2008: 366-368）。這說明著理想的規範性理論本身作爲知識便有它的價值。其二，某些論者認爲我們需要理想理論，因爲我們對價值和規範性原則的理解常常會被偶然社會事實和部分服從所扭曲，理想理論因此提供一個理解這些價值和規範性原則的純粹樣態，從而這種純粹的理想理論可以指引我們在不理想情境中的行動（Stemplowska, 2008: 326-339；2017: 287-290）。其三，有論者認爲我們需要理想理論作爲最終目標來確保我們在長遠的旅途上不會走上歧路（Simmons, 2010: 34）。上述這些回應本身都有相對應的討論，而孰對孰錯不是我要在這裡爭論的，但在理想和非理想理論這組概念中所發展出來的政治哲學方法上的對立，可以做爲界定馬克思（及恩格斯）政治哲學方法論的一個判準。我認爲馬克思和恩格斯採用的是沈恩和沃夫所倡議的辨識不義便足以的立場，同時他們大部分處理的是非理想理論的問題，我將在第五節討論這些立場。

三、政治道德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

除卻柯恩和羅爾斯的兩組概念之外，當代另一個重要的英國政治哲學家班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 1939-2003）也對主流分析政治哲學提出批判。威廉斯區分了政治道德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政治道德主義基本

[18] 參見類似的立場，Charles Mills (2005) & Colin Farrelly (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認爲「道德的先於政治的」，政治理論在這個傳統下基本上是應用道德哲學（2005：2-3）。簡單來說，我們必須先確立好對的或是好的道德（或規範性）原則是什麼，然後用確立好的道德原則來規定「政治」（the political）應該要如何行事。相反地，政治現實主義則認爲政治有其獨特性，評價或規範政治的標準應該來自政治場域內部，而不是一個外部的道德原則。對威廉斯來說，「政治哲學並不只是應用道德哲學……也不是法律哲學的一支……政治哲學必須使用獨特性的政治概念，像是權力，及其規範上相關的，正當性」（2005：3）。這是一個可以被深究且持續發展的立場。

首先我認爲，威廉斯對政治道德主義的界定正確地掌握了分析政治哲學的作法，亦即我們必須先確立什麼是好的或對的的規範性原則，下一步再將這個原則應用到某個政治主體上，然後再去評價所產生的結果或狀態是不是我們要的。另外，政治現實主義本身並不是要說政治是「不道德的」（immoral）或是「無關道德的」（amoral）（Galston, 2010: 387），而是政治本身有其獨特的議題和評價的標準，從而用一個外部的道德標準來規定政治本身應該如何，無疑是削足適履。再者，威廉斯提出了「基本正當性要求」（basic legitimation demand, BLD）作爲政治哲學特殊性的一個例子，他認爲在討論正義議題之前，在政治場域中還有更根本的秩序和統治正當性的問題要去處理（Williams, 2005：4-6）。這些意味著，政治哲學不但要處理秩序、權力和正當性等等非理想的情境之外，如何去形塑一個「適切的」（appropriate）的原則來規範政治必須回到政治實踐來考量。若是如此，政治現實主義很強調政治事實和實踐如何限制何謂好的或對的政治原則的思考，從而它必然是柯恩所謂的敏於事實的管制規則。政治現實主義因此總是必須考量在政治場域中特殊的實踐和慣習來做爲採用特定規範性原則的依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政治現實主義所處理的總是實踐和應用層次的問題。其次，政治現實主義看似是屬於羅爾斯區分中的非理想理論，因爲它的首要核心問題之一便是處理異議者對政治正當性的挑戰，這個問題在預設了完全服膺的理想理論中不一定會被處理。但另一方面，政治現實主義也可以在一個非常理想的情境中，藉由挑選特定的政治事實作爲採用哪些管制規則的依據，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現實主義也可以是理想理論的支持者。

再次，我並沒有要深入政治道德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的討論，但這組

臺灣大學圖書館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概念區分對於我們界定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很有幫助，因爲我將在下一節指出，馬恩強烈地反對任何政治道德主義。

四、實踐依賴和實踐獨立

如果政治現實主義告訴我們規範政治場域的原則必須內蘊於政治內部，從而我們必須理解政治實踐的運作並據此來形塑適切的規範性原則時，一個進一步的政治哲學方法的區分可以在此出現，亦即：實踐依賴和實踐獨立。這組區分是由 Andrea Sangiovanni 在其〈正義及政治優先於道德〉一文中提出的。實踐依賴的政治理論認爲，現存制度和實踐在證成「第一原則」（first principles）的基本樣態和論證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而現存制度和實踐並不如傳統分析政治哲學所認爲的只是道德原則的應用對象（2008: 137）。實踐依賴的政治理論因此認爲：「正義概念的內容、範圍和論證依賴於其所意欲治理的實踐的結構和形式」（2008：138）。與之相反地，傳統分析政治哲學所採取的便是一種獨立於實踐的政治理論。實踐獨立的政治理論認爲正義原則（或第一原則）的形塑、內容和證成是奠基在道德價值之上，從而現存制度和實踐並不影響我們形塑和論證正義原則（或第一原則）的方式（2008：139-140）。

關於實踐依賴和實踐獨立有幾個需要注意的點。首先，Sangiovanni 所要爭論的是第一原則的形塑和論證問題，從而他是在柯恩所謂的最終規範性原則的層次上（因此不是應用層次上）去爭論正義原則的本質問題，所以 Sangiovanni 是不會同意柯恩所說的最終規範原則是鈍於事實的。因爲若 Sangiovanni 不是在最終規範原則的層次上去同科恩爭論，那麼傳統分析政治哲學可以輕易的將實踐依賴的政治理論置於第二個層次上的討論：亦即在規範某個實踐或主體時我們應該採用什麼樣的原則，而認爲在第一層次上最終規範性原則依然是鈍於事實或獨立於實踐。因爲對傳統分析政治哲學來說，在第二個層次（應用問題）上，才是考量實踐和人性等等社會事實進入討論的層次。其次，柯恩所倡議的敏於或鈍於事實的區分，和 Sangiovanni 的實踐依賴和實踐獨立，是不同的。對柯恩來說現存制度和實踐只是其中一種需要排除的事實，而還有其他需要排除的事實要去處理，因此，柯恩的區分比 Sangiovanni 的區分要來的廣泛且根本。再者，由此而來的討論可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以是關於正義原則該不該延伸到全球範圍上的爭議，一個遵循實踐依賴的政治哲學家便會認爲，在全球層次上和國家層次上所應該採用的規範性原則是不同的。因爲全球層次和國家層次的實踐是不同的，實踐上的差異「限制了」規範不同實踐的原則是什麼的問題（Sangiovanni, 2007）。由此觀之，Sangiovanni 的區分涵蓋了政治現實主義和政治道德主義的區分，因爲政治場域的實踐本身只是眾多實踐的一種，從而實踐依賴和實踐獨立所涵蓋的討論比威廉斯的政治道德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的範疇更爲廣泛。

介紹完這四組概念之後，一個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四組概念能用光譜的方式來理解嗎？我認爲在柯恩跟 Sangiovanni 的兩組概念中，除卻柯恩所說的最終完全鈍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和完全獨立於實踐的原則之外，敏於事實和實踐依賴的規範性原則都因爲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事實或是依賴實踐，從而兩者有程度之分。但相對於此，我認爲非理想和理想理論以及政治道德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的區分很難以光譜的方式來理解，因爲這兩組區分所對立的是做規範性理論的「不同方式」。理想理論必然預設人們在理想情境中會嚴格的服膺規範，反之不如此預設的就是非理想理論。政治道德主義必然先探究普遍的道德原則再應用在政治場域，反之政治現實主義在思考規範原則所考量的是特定情境下的事實是什麼。從而當規範性討論中出現了不理想情境或是部分服膺時，該原則就落入非理想理論的範疇；當政治哲學僅是應用倫理學的時候，這種做理論的思維方式便是政治道德主義。在後面兩組概念中似乎不存在一個中介的可能，從而我懷疑他們可以用光譜的方式來理解。

當我們概要地回顧完當代政治哲學方法論的四個分類後，並且奠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的立場上，我們可以在這四個主要的分類中明確地界定馬克思（及恩格斯）的政治哲學方法：亦即，他們劍指柯恩所說的管制規則而不是最終規範性原則的問題，他們聚焦在辨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明顯不正義上（因此不是從理想正義社會的角度出發），他們反對政治道德主義，從而他們所偏好的形塑政治哲學的方式是實踐依賴的途徑。我將在下一節陳述這幾個立場，並附上相關的文本佐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馬克思式政治哲學方法

如同前面所說的，馬克思及恩格斯有未來理想社會的願景及規範性要求，但這個願景和規範性要求是不同於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接續我將說明一個馬克思式的政治哲學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法論立場。[19]

一、由辨識明顯不正義開始

當我們回顧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後，一個很明顯的特徵是他們「反對」從思索何謂理想社會主義社會作爲規範性理論的起手式。這背後的理由包括了建構未來理想社會的知識本身是現在不可知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是開放給未來人們決定的民主論證，更重要的是，我們不需要想像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因爲未來理想社會主義社會會是如何只能從資本主義的廢墟中去建立（不必要的論證），等等馬克思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在馬克思寫給 Nieuwenhuis 的信件中提到，他不認爲應該在即將到來的蘇黎世社會主義會議中討論如果當社會主義者掌權後，應該通過什麼樣的經濟和政治立法的問題；反而，社會主義者掌權後應該通過什麼樣的經濟和政治立法的問題只能通過「批判問題本身來回答」（Marx, 1992: 66）。簡單來說，我們可以藉由反思問題來得到答案。如同馬克思接續指出：「我們無法解決一個在其中不包含其解方**要素**的方程式」（ibid.，粗體字爲我的強調）。這不是什麼驚世駭俗的說法，若是我們無法透徹地理解問題，更遑論解決問題。但驚世駭俗的部分是不需要思索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因爲馬克思認爲「只能」由批判分析問題本身來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式，而不是去空想未來理想社會的樣態。在政治哲學上這意味著，馬克思會反對「理想理論先於非理想理論」的命題，也因此在方法論上和起手便聚焦在理想理論的政治哲學分道揚鑣。

撇除「我們是否總是能從批判分析問題中找到解決問題的相關要素」的

[19] 「馬克思式的」（Marxian）政治哲學，而不是「馬克思主義」（Marxist）政治哲學，因爲我相信我所歸納的這些特點是貼近馬克思（及恩格斯）本人的立場。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是可以完全偏離馬克思及恩格斯本人所親近的立場。這是一點細微的差異。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機構典藏庫

爭議，馬克思認爲，批判、分析、拆解問題本身才是從事理論或是解決問題的起點。因爲他認爲解決問題的要素總是蘊含在問題本身。也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要尋求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要素，也只能從分析批判資本主義運作本身開始。這個立場在政治哲學方法論的討論中的特色便是，從辨識明顯的不正義開始的政治哲學，而不是先從構思何謂理想社會主義社會開始。雖然對於這個立場的主要倡議者沈恩或是沃夫來說，政治哲學的主軸應該是去辨識明顯可見的不正義而不是構思理想正義理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爲如果我們不用藉由理想理論就可以「直接」辨識明顯可見的不正義，這對政治哲學來說就夠了。這預設了政治哲學的目的是用來解決現實世界中的不正義，而主要不是在知識上尋求何謂正義、自由、平等的答案而已。同時，如果我們可以直接辨識明顯可見的不正義，那也不需要理想的正義理論，所以沈恩和沃夫「反對」羅爾斯所認爲的「理想理論是政治哲學必要條件」的命題。因此，即便沈恩和沃夫不見得會同意馬克思所認爲的「解決問題的要素就蘊含在問題本身」的說法，他們反對理想正義理論的理由也不是知識論上的理由（亦即我們無法得知關於未來理想社會的相關知識），這兩位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非理想理論的倡議者，[20] 都認爲從辨識理解不正義作爲政治哲學的起始點便足以。在立場上，馬克思和由辨識明顯不正義開始的政治哲學立場有十足的親近性。

但另一方面，不論是烏托邦社會主義或是偏好理想正義理論的政治哲學家，都認爲要改善社會或是辨識不正義都需要預設了一個理想的良序社會，作爲一個終極目標或是評價現況規範性標準。但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是不同於以羅爾斯爲首的理想理論的倡議者，因爲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未來藍圖本身不必然要符合道德原則也不必然理想化了藍圖的方方面面。馬克思反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爲我們現在無法得知關於未來理想社會主義社會的知識（知識論批判），但知識論批判並無法適用於羅爾斯這類倡議理想情境下的理性人會依據某些道德原則選擇某些規範性原則的理想理論。因爲理想理論是給予我們前往良序社會的行動綱要，而不

[20] 見 Leopold (2020: 41-43) 說明沈恩如何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沃夫本人則是寫作《爲什麼今日你仍需要閱讀馬克思？》一書。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是用來按圖索驥的社會藍圖，也因此理想理論的良序社會不必然需要涉及未來某個特定社會的知識，反而理想理論的倡議者多少會認爲自己的理論是「普遍的」（universal）且「跨時空」（timeless）爲眞的規範性原則。

另外，如果理想理論本身並不是用來有效地引導我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轉型，而僅是作爲指引行動的某個規範理想，我不認爲馬克思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可以同時適用於理想理論的倡議者。因爲說到底，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和理想理論的倡議者們雖然有所交疊，但終究不是同一回事。從而我對於馬克思是否會反對「理想理論是政治哲學必要條件」的命題本身持保留態度，譬如我們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看到，馬克思認爲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成熟階段，勞心和勞力的對立會被取消，並能超越資產階級法權觀念從而施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生產模式（Marx, 1989b: 87；2017: 214-215）。這樣說法即便不算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細緻描繪，也是非常理想化下的描述，從而認爲馬克思沒有任何理想社會的願景，以及他會反對理想理論的這兩件事，是與文本相悖的。據此，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第一個特徵是從辨識不正義開始，也因此拒絕「理想理論先於非理想理論」的命題。

二、非理想和理想的政治理論

若是馬克思式政治哲學是從辨識明顯不正義開始，特別是從辨識資本主義的不義、負面的外部性和內在矛盾開始，那麼，似乎很明顯地馬克思式政治哲學「主要是」處理「非理想政治理論」的問題，也就是考量只有「部分人們」服從規範的不理想的情境下所該採用的原則會是什麼（Rawls, 1999a: 215-216）。我說主要是處理「非理想政治理論」的問題，而不是只處理這個問題，因爲如同上一節所指出的，至少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成熟階段的描繪中，就有許多非常理想化的人類處境或社會狀態就出現了。譬如說相較於馬克思晚期花費十年心血的《資本論》三卷來說，從未出版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反而吸引了許多關注。裡面所談到的私有財產所產生的異化關係及其廢除涉及了很理想的敘事，馬克思在其中主張：

> 共產主義是作爲人的自我異化的私有制的積極揚棄，因而是藉由人且是爲了人的人性本質的實際領有；所以便自視爲一種社會性的、亦即人性的人全然的、有意識地且是人在至今發展的全部財

臺灣人文與醫療期刊資料庫

> 富範圍內的回歸……[共產主義]是人跟自然以及人跟人之間衝突的眞正消除，是存在和本質之間、對象化和自我確證之間、自由和必然之間、個體和種屬之間衝突的眞正消除。（Marx, 1975b: 296）

從這個段落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有許多過去的對立衝突可以得到化解，從而人可以從異化關係中解放回復到一個全人的狀態之中。這樣的描述不可不謂是一個理想狀態的描述，從而我們可以說馬克思在手稿中提供了共產社會的願景或共產主義的理想理論。[21] 據此，若要說馬克思完全沒有理想的政治理論的部分，這個說法對我來說是錯誤的且與文本相悖的。綜合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哲學，以及自 1840 年代初期後持續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批判來看，比較適切的說法應該是馬克思（及恩格斯）晚期聚焦相當多的精力在非理想的政治理論上，也就是資本主義批判上，而較少或比較不願意討論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原則或描述上。[22]

若是上述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會有兩個接續的問題：其一，馬克思式的非理想政治理論是什麼，其二是對馬克思來說，由非理想政治理論到理想政治理論的轉型關係是什麼。關於第一個問題我會在此節的第四小節中處理，我認爲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本體不但是非理想政治理論，更是依賴於實踐的政治理論。第二個問題對我來說是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供了一個從非理想理論到理想理論的階段論的主張：從非理想理論的資本主義批判→到所謂過渡綱領的共產主義社會初始階段→再到理想理論的共產主義社會成熟階段（Marx, 1989b: 86-87；2017: 214-215）。這個具體從指認「資本主義社會不義」到過渡階段再到理想的共產主義的階段論，是當代政治哲學方法的討論中所鮮見的。並且對我來說這個階段論至少有兩個重要的意涵。

---

[21] 但我們也可以在 1843 年馬克思回覆 Arnold Ruge 的信件中看到，馬克思認爲「因此，共產主義特別是一種教條式的抽象；然而在這方面，我不是在思考某些想像的或是可能的共產主義，而是像卡貝特、德札米、魏特林等人所教導的實際存在的共產主義」（Marx, 1975a: 142-143）。同時，孫善豪（Marx, K. & F. Engels 著，孫善豪譯，2016：ix-x）認爲馬克思甚少描繪共產主義社會，也嚴峻拒絕對理想狀態的描繪。

[22] 這個差異似乎又再再說明了馬克思早期和晚期是有一些轉變。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一，在分析政治哲學的方法討論中，大多數人不是支持「理想理論先於非理想理論」就是支持「非理想理論足矣」，這兩種立場。但馬克思的階段論明顯開啓了一種「從非理想理論到理想理論」的路徑。我們如何在智識上和實踐上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甚至是共產主義社會，在主流的討論中是缺席的，從而探究馬克思的階段論是個有意義的問題。[23] 其二，馬克思所主張的並非「規範次序」上「非理想理論先於理想理論」，而應該是「要『知道』理想理論的問題必須從非理想理論著手」的「知識論」主張。當理想理論的倡議者想的都是規範次序的問題時，對馬克思來說怎麼從現在社會去推敲下一個社會的可欲型態才是形塑規範性原則的方法。[24] 我們只能從所身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去積攢大量知識，從而去推敲共產主義初始的過渡階段，進而是一個在內容上無法取得任何經驗可能的共產主義社會成熟階段。我認爲將這個階段論的主張置於理想理論和非理想理論的框架下來看，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知識論的宣稱，亦即社會進展的過程僅能從批判現存社會去想望下一個階段的可欲樣態是什麼。因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問題就是他們認爲，他們可以直接爲社會規定下一個階段的樣態而不必受制於社會實際運作的模式。但如果馬克思關於社會轉型的知識論命題是對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就只是在空想而已，空想因爲毫無現實基礎。據此，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第二個特徵是主要聚焦在非理想政治理論，亦即在實際資本主義社會中僅有部分人服從規範的不理想處境，並且認爲在知識論上我們僅能從批判現存社會去概略知曉下一個社會階段的樣態。

三、反政治道德主義

所謂政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有幾個目標和特色：政治現實主義希望提供關於政治場域的優質且充分的描述，並提供政治行動者適切的行動指引

---

23 礙於篇幅我無法在此篇文章中探究這個議題。

24 辨識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正義是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起手式，但並非結尾，從而一定可以從辨識出來的不正義去進一步推導出馬克思對自由、民主、正義、平等的正面看法。區分政治哲學方法論的起手式在於，分析政治哲學主流思考是從理想社會或是理想原則出發，再去討論實際社會中的不正義問題。而馬克思式的政治哲學方法在思索這類理想社會和理想原則時，總是必須考量某個特定社會的事實作爲參照點來制定規範，這便是所謂的依賴實踐的政治理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leat, 2018: 3）。同時，政治現實主義希望能發展「獨特的政治規範性」（a distinctively political normativity），亦即他們想要提供關於政治與道德之間細緻複雜關係的更好的理解（Sleat, 2018: 7）。因此，政治現實主義拒絕把政治視爲實現某個理念或是道德原則的工具，反對傳統分析政治哲學中先確立某個規範性原則和理念之後再將其套用在政治身上。如同 Raymond Geuss 所說的：「政治哲學……不應該首先關注並且從人們應該理想地（或應該理性地）行動開始……而是根據社會、經濟、政治等等制度在某個特定時間點的某個社會實際運作中，以及在特定情況下眞正推動人類採取行動的因素開始」（2008：9）。簡單來說，政治現實主義認爲政治當中的某些人類處境不但是政治哲學所應該關懷的（諸如權力、正當性、衝突等等問題），也認爲何謂好的規範性政治原則是需要考量政治場域中的實踐來形塑和論證。當然，因爲政治現實主義者對於怎麼理解政治本身就充滿歧異（Sleat, 2018: 2），所以我們最好把政治現實主義理解爲一支有著類似傾向的政治哲學取徑而不必然共同支持某些「實質」的規範性政治原則。

依據上述對政治現實主義的界定，馬克思可以被視爲是政治現實主義者。主要理由有二：其一，馬克思理論中有許多政治現實主義者會認爲是內蘊於政治的問題，諸如階級衝突、資本主義危機，以及資產階級跟無產階級之間的權力關係等等實際具體的運作問題。因此，我們可以依據馬克思理論中關於實際政治的關注去論證他是個政治現實主義者。但由於政治現實主義仍是一個發展中的理論（所以論述馬克思是或不是政治現實主義者仍需一些具體標準），同時我認爲政治現實主義的方法和我接續要討論的實踐依賴的政治理論是高度重疊，所以我將擱置這個部分到下一小節討論。

其二，在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中，他們明確地反對藉由實現某個理念來改革社會，從而這顯現了反對政治道德主義的態度。兩個主要的文本證據包括在〈論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論道：「[工人階級]沒有需要實現的理念，而是要釋放正在崩潰的舊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的新社會要素」（Marx, 1986: 335；2019: 897）。[25] 或是在《共產黨宣言》

[25] 必須再次強調的是，馬克思並不是說工人階級沒有或不需要目標，而是他們的目標並不是由跨歷史有效的理念所驅使（Cohen, 2001: 193-194, n.29）。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中他們主張：「共產黨人的理論結論絕非基於這位或那位潛在改革者所發明或發現的觀念或是原理之上」（Marx & Engels, 1976: 498）。這兩句話呈現了馬克思的反政治道德主義，因爲無產階級不需要向外訴諸於某個理念或是規範性原則來指引行動或是作爲目標，反而工人階級的存在和被壓迫和剝削的處境本身就給予明確的政治行動指引和目標：亦即反壓迫跟反剝削。從而取消階級關係成爲一個立即的政治目標。這說明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願景從來都不是政治道德主義式的。

另一個直接的文本證據是馬克思在 1843 年回覆 Ruge 的信件中他指出：

> **我們不會以一種教條的方式用新原則來面對世界：真理即此，伏首稱臣！**我們根據世界自身的原則來爲世界制定新的原則。我們不會對世界說：停止你們的鬥爭，他們是愚蠢的；我們會給予你們眞正的鬥爭口號。我們只是向世界展示它眞正爲之奮鬥的東西，而意識是它眞正必須獲得的，即使它並不願意如此。[26]（Marx, 1975a: 144）（粗體字爲我的強調）

引文第一句所反對的便是政治道德主義所倡議的那種先確立了一種置外於實際世界的（規範性）原則，然後要求實際世界依照這個原則進行改變。「我們可以從這句引文中看到，馬克思明確的反對政治道德主義」。[27] 政治道德主義把世界（或是政治或其他實踐）作爲實現某個置外於其應用對象的規範原則或理念的工具或媒介而已。相反地，如同我接續要在下一節所指出的，馬克思採用的是從實踐本身去發展規範性原則的政治哲學方法，也就是實踐依賴的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不爲世界另外規定一

---

[26] 在這個回信中，有一句類似馬克思在〈費爾巴哈綱領〉的著名句子：「迄今爲止，哲學家以不同的方式來詮釋世界，但重點是改變它」，即「Hitherto, philosophers have had the solution of all riddles lying in their writing-desk, and the stupid, exoteric world had only to open its mouth for the roast pigeons of absolute knowledge to fly into it」(Marx, 1975a: 142)。

[27] 一個人可以單純只反對政治道德主義但不是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因爲他對於何謂適切的政治與道德的關係沒有主張。再者，政治現實主義者聚焦在實際的政治場諸如：國家、政府和政治制度等等實踐之上，但馬克思本人倡議的是似乎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將會消亡，從而馬克思是否是政治現實主義者有待更多的論述去證明。或是毋寧說，政治現實主義是依賴實踐的政治理論的一種類型，因爲政治實踐只是眾多實踐中的一種。

臺灣人文學會版權所有

個運作方式，而是從世界的實際運作中去發展新的可能。[28]

再者，對馬克思來說，一個可以去政治化、去脈絡化且普遍爲眞的道德原則是可疑的，也是意識形態。一般而言，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可以被粗略地理解爲上層建築（包括文化、政治、社會習俗、宗教、道德等等）規定了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規定」了上層建築的內容。[29] 這個所謂「基礎規定了上層建築」的立場，常被引用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中的一段：

> 人是自己的想像、觀念等等的生產者，不過這裡所說的人是實際的（wirklichen）、從事活動的（wirkenden）人，他們是受限定的：受自己的「生產力的特定發展」和（與之對應的）「交往的特定發展」——直到其最發達的型態——所限定（bedingt）。意識（das Bewußtsein）除了是「有意識的存在」（das Bewußtsein Sein）之外，永遠不能是別的什麼東西，而人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Marx & Engles 著，孫善豪譯，2016：24）

這裡，馬克思批判的是那些認爲上層建築（不論是文化、政治、社會習俗、宗教、道德等等）有其獨自發展歷史或是獨立的生命，可以脫離或是不受制於基礎（理解爲生產力跟生產關係）。亦即，各類的上層建築，其實都可以回到實際的歷史社會情境或生產關係中去尋求一種因果關聯性。例如，騎士精神曾經是封建社會中，貴族的尙武精神，但是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改變，騎士不再需要保護莊園，騎士精神也僅剩下某種借喻的功用。相較於唯心論者，視精神或是理念有其獨自的歷史發展和生命；唯物論者認爲所有的上層建築，都可以找到它相對的物質基礎或歷史發展。而一個宣稱自己沒有物質基礎的理念或規範性原則，對馬克思來說，不是自視不清（從而是意識形態），就是非常可疑。另一方面，即便可以找尋到一個沒有物質基礎的理念或規範性原則，我們也可以

---

28 我並不爭論這兩種方式孰優孰劣，那不是這篇文章的目的。

29 對於上層建築是由基礎所決定（因此是決定論），或僅僅是反映或規定了上層建築，即是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孫善豪本人反對決定論，並將兩者的關係詮釋爲規定，亦即基礎給予上層建築內容。見孫善豪（2009：145-163）。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進一步的質問，要求實際世界聽令於一個宣稱其獨立於這個實際世界的理念或原則的行爲，是否都必須面對「立理限事」的問題。爲世界規定一套注定不合身的西裝。

若是如此，馬克思不只是如同政治現實主義者一樣反對粗暴地將某個理念或規範性原則套用到政治上來指引人們該如何行動，他更懷疑是否有一個可以不反映物質基礎的理念和規範性原則。[30] 據此，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第三個特徵是反政治道德主義，亦即，我們不爲資本主義社會規定某些置外於該社會的理念或規範性原則；反而規範性原則或是理念必須依據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來形塑和論證，諸如階級衝突、剝削、和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外部性，都必須作爲形塑規範性原則的考量和限制。

四、依賴實踐的政治理論

上述我提到馬克思有一種非理想的、親近政治現實主義的政治哲學，而我認爲馬克思式政治哲學就是實踐依賴的政治哲學。我們可以在上述三個政治哲學方法論的分類看到馬克思式政治哲學偏好某個立場，但我認爲馬克思式政治哲學最適切的理解便是「實踐獨立和實踐依賴」的區分。

我們由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中看到，他們反對描繪一個未來理想社會主義的藍圖是因爲他們認爲「新社會只能從批判舊社會中去發展」。所以他們從辨識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正義開始，反對政治道德主義，從而他們處理的是具體且不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如同 Geoghegan 所說的，馬克思及恩格斯所反對的不是期望（或願景）本身，而是未能將這種期望奠基在資本主義基本動力的理論框架中（1987 : 27-28）。更重要的是，實踐依賴的政治理論認爲，正義的概念或是其他規範性原則的「內容」、「範圍」和「論證」依賴於其所意欲治理的實踐的結構和形式（Sangiovanni, 2008: 138）。也因此，他們所接受的規範性原則的內容、範圍和論證是受實際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和形式所影響。

---

[30] 這點可能是馬克思跟政治現實主義者之間的一個有待釐清的差異，因爲政治現實主義者主張的是政治與道德之間有一個適切的關係，而不是徹底的道德懷疑論者（Sleat, 2018: 14,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什麼是依賴？我們可以使用柯恩說法來解釋。譬如說，馬克思反對階級對立，從而從中得出的規範性原則是「我們應該要反對階級關係」。「我們應該要反對階級關係」可以進一步區分爲「資本主義社會有階級關係」的事實，跟譬如「一個平等社會是反對階級關係」的更鈍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而「一個平等社會是反對階級關係」可以進一步區分爲「某些人類社會有階級關係」的事實，跟譬如「一個平等社會是反對不平等關係」的更鈍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因此，「某個規範性原則依賴於某個實踐」的意思是，該規範性原則的內容是由實踐裡面所遭遇的問題來形塑的，以及「實踐結構內的事實」支撐或證成「某個與該實踐相關的規範性原則」是合理正當的，以及實踐所涉及的範圍限制了該規範性原則的適用範圍。對於某個實踐的理解和認知，給予我們制定相關規範性原則的內容、適用範圍和論證。而馬克思所形塑的規範性原則或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願景便是建構於資本主義的認識和批判之上。

相關的文本證據包括，馬克思在寫給 Ruge 的信件中表示：「我們不教條般地期許世界，而是希望透過批判舊社會來找尋新世界」（Marx, 1975a: 142）。或是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說：「在此我們正在處理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其並非從第一原則『所發展而來』，相反地，其自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而來」（Marx, 1989b: 85；2017: 213）（馬克思的強調）。或是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說道：「共產黨人的理論只是整體地描述從既存的階級鬥爭與眼前正在發生的歷史運動當中產生的眞實關係」（Marx & Engels, 1976: 498）。或是在〈論法蘭西內戰〉，馬克思說道：「工人階級……沒有需要實現的理念，而是要釋放正在崩潰的舊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的新社會要素」（Marx, 1986: 335；2019: 897）。從這三個不同時期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的依賴於實踐的政治哲學方法，亦即未來社會的願景或規範性原則需要來自於對舊世界的批判，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來形塑。據此，馬克思式政治哲學必須建立在對資本主義運作的社會科學知識之上，其內容、適用範圍和論證都必須來自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分析開始。

若是馬克思式政治哲學是依賴於實踐（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的時候，如何建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理解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也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因此我們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烏托邦社會主義的一個批判是，他們忽視（或是未能預見）無產階級作爲一個被壓迫且逐漸壯大的普遍階級是革命主體的這件事。當我們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現了兩個主要對立的階級，佔有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以及不佔有生產工具的無產階級時，資本主義社會作爲階級對立的社會的事實，便給予了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特定的內容、範疇和論證基礎。又或如我們在《資本論》當中看到馬克思如何拆解資本主義商品交換的邏輯，以及人類勞動力作爲商品時必然產生的不等價的交換關係，以及剝削是如何建立在無產階級僅能透過向資產階級販售勞動力來取得消費財的階級關係之下，或是資本主義社會運作到極致所產生的危機和環境問題等等。這一層又一層的資本主義社會分析，提供了馬克思式政治哲學多層次的規範性原則的內容、範疇和論證基礎，也因此是特別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規範性政治哲學。

而馬克思又認爲「迄今爲止，所有人類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Marx, 1976a: 482），人類社會的階級鬥爭又係因於社會剩餘的搶奪和剝削問題上。若是如此，奠基在這兩個馬克思認爲是迄今人類社會的共同事實之上，即階級鬥爭和剝削問題，馬克思式政治哲學似乎也可以發展出一套適用於過去人類所有社會的規範性原則的主張。因此，依賴於實踐的政治哲學（或是柯恩所說的敏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是可以進一步區分爲「專注在特定人類社會的事實」跟「專注在普遍人類社會的事實」之上的兩種政治哲學路徑。而這兩種進一步的政治哲學路徑的差異就在於我們如何辨識何謂特定人類社會的事實以及何謂人類社會的普遍事實。但如同政治現實主義者對於怎麼理解詮釋政治充滿歧異，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社會和理解人類社會的普遍事實，更是一個本身就充滿不同觀點的問題。奠基在資本主義社會分析之上的馬克思式政治哲學也必然在某些資本主義事實認定上產生歧異，從而產生不同的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不正義的規範性原則。[31]

敏於事實的規範性原則若是如同柯恩所說的需要藉由事實來「支撐」（grounding）他們的規範性主張，敏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規範性原則就需要

[31] 但這個歧義本身是有限的，譬如我們可以分析資本主義剝削的不同樣態，但不能說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剝削的。從而這些歧義都可以藉由訴諸資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處理。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資本主義知識作爲支撐。而馬克思或是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哲學上的優勢是，他們所提供的資本主義分析和社會科學知識已經成爲一個很深厚的學科典範，特別是馬克思所撰寫的《資本論》已經是理解資本主義社會所不可迴避的典籍。其解釋力仍是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運作的基石。據此，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問題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知識上的匱乏，又或者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部分認識是錯誤的。由此而生的未來理想社會的倡議都不具參考價值，一來這些倡議可能是泛泛而論的事實主張，二來這些倡議本身可能包括錯誤的事實認知。從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在中文語境中也被戲稱爲「空想社會主義者」，「空想」來自於他們對於實際社會運作的幼稚或無知，而想要藉由實踐這些「空想」來進行社會轉型又是其中的極致典範。

據此，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第四個特徵是依賴於實踐的政治哲學，特別是依賴於資本主義社會分析的政治哲學。其特點在於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和知識是形塑相對應的規範性原則時所不可或缺的，因爲實踐給予了形塑相對應規範性原則的內容、範疇和論證基礎。總結來說，奠基在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之上，我們可以在當代分析政治哲學方法論的爭議中，界定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四個主要特徵：「從辨識不正義開始，且聚焦在人們不會服從規範的不理想情境的非理想理論，以及明確的反對政治道德主義的途徑，最後是依賴實踐的政治哲學方法」。而我認爲這是在我們回顧馬克思及恩格斯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之後，可以明確地得到的一個馬克思式政治哲學方法的立場。

柒、結論

本文主張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是作爲界定馬克思式政治哲學方法的一個重要標的，從而任何與他們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相悖的馬克思式政治哲學都需要很好的理據去回覆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的定錨作用。其次，當我們借用當代分析政治哲學討論方法論的四組概念區分之後，吾人可以清楚地標示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立場。當然，本文從來都不是要去捍衛這四組對立的方法論立場中的任何一個特定立場，從而馬克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思採取某個特定立場本身並無法去論證該立場就是一個好的政治哲學方法。但長久以來，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和規範性政治哲學之間就有一種曖昧不明的關係，就像是在 1980 年代在英國展開的那場馬克思正義觀的論爭，或是如同柯恩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和規範性哲學之間有一種緊張關係（Cohen, 1995: 1-2）。但同時馬克思的著作和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很強的規範性的傾向，但這種傾向又因爲其所支持的反政治道德主義而被誤認爲是道德懷疑主義（或是反對形塑任何規範性原則）。然而，當我們用四組政治哲學方法論的概念區分來界定馬克思的立場時，很明顯的馬克思是有特定的規範性政治哲學的立場，這個立場是反政治道德主義，亦即反對先確立某個普遍爲眞的道德或規範性原則再拿來批判或評價某個社會現象或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的反政治道德主義因而不是主張政治是「不道德的」或是政治是「無關乎道德的」兩種立場。這開展了依賴於實踐且由辨識明顯不正義開始的規範性政治哲學的可能性。

本文因此想藉由馬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的思想史回顧，來進一步拓展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基礎。同時我僅在非常一般的層面上去論述馬克思及恩格斯如何在四組對立的政治哲學方法的概念中佔據某個立場。就此而言，這是一個非常一般性的回顧和界定，我相信每一組政治哲學方法論的概念都可以再進一步的發展成獨立的論題：像是「馬克思式的政治現實主義」、「馬克思式的理想和非理想理論」或是「馬克思式的實踐依賴政治哲學」。除卻這類方法論上的討論之外，我也相信我們可以具體的進入馬克思式的實踐依賴政治哲學，去形塑非常具體的馬克思式政治哲學的血和肉：像是「反剝削理論」、「反階級社會」、「反異化理論」、或是「馬克思式的政治正當性」、「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問題」、「資本主義的外部性問題」等等。從而，這些討論因爲奠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之上，它們可以有非常強的實踐上的指引。這是當代政治哲學偏向理想政治理論的倡議者們，所常常面對的批判，也就是理想理論沒有指引行動的實效。本文因此希望能作爲任何有志發展馬克思式政治理論者的一個索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Marx, K. & F. Engels 著，孫善豪譯，2016，《德意志意識型態 I. 費爾巴哈原始手稿》，臺北：聯經出版社。譯自 *German Ideology I. Feuerbach's Original Manuscript*. N.p.n.d. Marx, K. & F. Engels. Shan-hao Sun. trans. 2016. *Deyizhi yishixingtai I. feierbaha yuanshi shougao* [*German Ideology I. Feuerbach's Original Manuscript*]. Taipei: Lianjing publishing. Translated from *German Ideology I. Feuerbach's Original Manuscript*. N.p.n.d.

孫善豪，2009，《批判與辯證：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論文集》，臺北：唐山出版社。Sun, Shan-hao. 2009. *Pipan yu bianzheng*: *makesizhuyi zhengzhizhexue lun wenji* [*Critique and Dialectics: Essays on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Taipei: Tonsan publishing.

萬毓澤，2018，《資本論完全使用手冊：版本、系譜、爭議與當代價值》，臺北：聯經出版社。Wan, Yu-ze. 2018. *Zibenlun wanquan shiyong shouce: banben, xipu, zhengyi yu dangdai jiazhi* [*A Complete Instruction Manual for Capital: Editions, Genealogy, Controversies,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Taipei: Lianjing publishing.

萬毓澤，2021，〈馬克思主義（上）：古典及其基礎〉，《華文哲學百科》網頁，http://mephilosophy.ccu.edu.tw/entry.php?entry_name=馬克思主義（上）：古典及其基礎，2022/5/4。Wan, Yu-ze. 2021. "Makesizhuyi shang: gudian jiqi jichu" [Marxism (Volume 1 of 3): Classical Foundations]. in http://mephilosophy.ccu.edu.tw/entry.php?entry_name=馬克思主義（上）：古典及其基礎。Latest update 14 November 2021.

蕭高彥，2020，《探索政治現代性：從馬基維利到嚴復》，臺北：聯經出版社。Xiao, Gao-yan. 2020. *Tansuo zhengzhi: xiandaixing cong majiweili dao yanfu* [*Exploring Political Modernity: From Machiavelli to Yan Fu*]. Taipei: Lianjing publishing.

二、西文部分

Avineri, S. 1973. "Marx's Vision of Future Society and the Problem of Utopianism." *Dissent* 20(3): 323-331.

Carver, T. 2008. "Marx and Marxism."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eds. Theodore M. Porter &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3-2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arver, T. 2010. “Marx and Marxism.” In *The History of Continent Philosophy*, ed. Alan D. Schrif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95-444.

Claeys, G. 2018. *Marx and Marxism*. London: Pelican.

Cohen, G. A. 1995.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hen, G. A. 2001. *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G. A. 2008.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G. A. 2011. *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A. 2004. *Marx*. Oxford: Oneworld Publications.

Cunliffe, J. & A. Reeve.1996. “Exploitation: The Original Saint Simonian Account.” *Capital & Class* 20(2): 61-80.

Engels, F. 1982. “Engels to Marx.”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8*,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6-30.

Engels, F. 1989. “Preface to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 of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457-459.

Engels, F. 1990a.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29-276.

Engels, F. 1990b.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Philosophy.”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357-398.

Estlund, D. 2011. “Human Nature and The Limits (If An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9(3): 207-237.

Farrelly, C. 2007. “Justice in Ideal Theory: A Refutation.” *Political Studies* 55(4): 844-864.

Galston, W. 2010. “Realism in Politic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9(4): 385-411.

Geoghegan, V. 1987. *Utopianism and Marxism*. London: Methuen & Co.

Geuss, R. 2008. *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udis, P. 2013. *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Leiden: Brill.

Kumar, K. 1991.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Lawrence & Wishart. 2022.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in https://lwbooks.co.uk/marx-engels-collected-works/read-and-search-online. Latest update 31 October 2021.

Leopold, D. 2005. "The Structure of Marx and Engels' Considered Account of Utopian Social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26(3): 443-466.

Leopold, D. 2007. "Socialism and (the Rejection of) Utopia."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2(3): 219-237.

Leopold, D. 2012. "'Socialist Turnips': The Young 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Communism." *Political Theory* 40(3): 347-378.

Leopold, D. 2014. "Marx and British Socialism." In *Oxford Handbook of Nineteen-Century British Philosophy*, ed. William Mander.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402-422.

Leopold, D. 2015. "Marx, Engels and Other Socialism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s. Terrell Carver & James Far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49.

Leopold, D. 2016. "On Marxian Utopophobi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54(1): 111-134.

Leopold, D. 2019. "Marx's 'Hegelian' Critique of Utopia." In *From Marx to Hegel and Back*, eds. Victoria Fareld & Hannes Kuch. London: Bloomsbury, 178-195.

Leopold, D. 2020. "Karl Marx and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eds. Chiappero-Martinetti, S. Osmani, & M. Qizilba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58.

Levitas, R. 2011. *The Concept of Utopia*. Oxford: Peter Lang Ltd.

Lovell, D. W. 1992. "Socialism, Utopianism and the 'Utopian Socialist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14(2): 185-201.

Lukes, S. 1984. "Marxism and Utopianism." In *Utopias*, eds. Peter Alexander & Roger Gill. London: Duckworth, 154-167.

Marx, K. & F. Engels. 1975a (1845). "The Holy Family."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5-211.

Marx, K. & F. Engels. 1975b (1845). "A Fragment of Fourier's on Trad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613-644.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Marx, K. & F. Engels. 1976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477-519.

Marx, K. & F. Engels. 1988 (1872). “Fictitious Spli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3*,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79-123.

Marx, K. 1975a (1843). “Marx to Arnold Rug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41-145.

Marx, K. 1975b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29-346.

Marx, K. 1976a (1845). “The German Ideology.”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39.

Marx, K. 1976b (1848). “The *DÉBAT* Social of February 6 on The Democratic Association.”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537-539.

Marx, K. 1986 (1871).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2*,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307-355.

Marx, K. 1989a (1874). “Notes on Bakunin’s Book: Statehood and Anarchy.”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487-526.

Marx, K. 1989b (1875).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4*,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75-99.

Marx, K. 1991 (1877). “Marx to Friedrich Adolph Sorg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5,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82-284.

Marx, K. 1992 (1881). “Marx to 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46*,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65-67.

Marx, K. 1998 (1967). “The Role of Credit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7*, ed.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432-438.

Marx, K. 2017.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2019. *The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Vers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ills, C. W. 2005. "'Ideal Theory' as Ideology." *Hypatia* 20(3): 165-183.

O'Neill, O. 2009. "Applied Ethics: Naturalism, Normativity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26(3): 219-230.

Ollman, B. 1977. "Marx's Vision of Communism: A Reconstruction." *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8(1): 4-41.

Paden, R. 2002. "Marx's Critique of the Utopian Socialists." *Utopian Studies* 13(2): 67-91.

Pojman, L. P. & J. Fieser. 2012. *Ethics: Discovering Right and Wrong*. Boston: Wadsworth.

Rawls, J. 1999a.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ite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1999b.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wls, J. 2001.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ngiovanni, A. 2007. "Global Justice, Reciprocity, and the State."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5(1): 3-39.

Sangiovanni, A. 2008. "Justice and the Priority of Politics to Mor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6(2): 137-164.

Sargent, L. T. 1994. "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 *Utopian Studies* 5(1): 1-37.

Sen, A. 2009. *The Idea of Justice*. London: Penguin.

Simmons, J. A. 2010. "Ideal and Nonideal Theor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8(1): 5-36.

Sleat, M. 2018. "Introduction." In *Politics Recovered: Realist Though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d. Matt Slea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5.

Smith, P. B. 2009. "Reflections on Aspects of Marxist Anti-Utopianism." *Critique* 37(1): 99-120.

Stemplowska, Z. & A. Swift. 2012. "Ideal and Nonideal Theor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David Estlu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73-389.

Stemplowska, Z. 2008. "What's Ideal About Ideal Theory?"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34(3): 319-340.

Stemplowska, Z. 2017. "Nonideal Theory." In *A Companion to Applied Philosophy*, eds. Kasper Lippert-Rasmussen, Kimberly Brownlee, & David Coad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84-296.

Swift, A. 2008. “The Value of Philosophy in Nonideal Circumstances.”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34(3): 363-387.

Thomas, P. 1991. “Critical Reception: Marx Then and Now.”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 ed. Terrel Car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3-54.

Valentini, L. 2012. “Ideal vs. Non-ideal Theory: A Conceptual Map.” *Philosophy Compass* 7(9): 654-664.

Vieira, F. 2010. “The Concept of Utopia.”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 ed. Gregory Clae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7.

Webb, D. 2000. *Marx, Marxism and Utopia*.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Williams, B. 2005. “Realism and Moralism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 ed. Geoffrey Hawthor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7.

Wolff, J. 2015. “Social Equality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Social Equality: On What it Means to be Equals*, eds. Carina Fourier, Fabian Schuppert, & Ivo Wallimann-Hel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9-225.

Yassour, A. 1983. “Communism and Utopia: Marx, Engels and Fourier.”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26(3): 217-2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rx's (and Engel's) Critiques of Utopian Socialism:
As a Method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Kai-li C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Karl Marx (1818-1883) and Friedrich Engels's (1820-1895) critiques of utopian socialism to formulate a Marxian 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is, the way that Marx or Marxists should have preferred to engage 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therefore, is divided into two major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lains and clarifies what Marx and Engels's critiques of utopian socialism are, and the second part takes their critiques of utopian socialism as a critical reference point to define Marx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After introducing the four main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in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of the methodology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I explain why their critiques can be understood as having preferences for certain positions toward the methodology of 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 Accordingly, when we locate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utopian socialism within the four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we are able to outline the methodology of Marx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words: Utopian Socialism,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Karl Marx, Political Moralism, Practice-dependent Principles

---

* DOI:10.6166/TJPS.202209_(93).0001

**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E-mail: kairespire@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4 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批判：作爲一種政治哲學方法 鄭楷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